

盈余管理对政府补助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谢海娟^{1,2}(副教授)

【摘要】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企业盈余管理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负向盈余管理越大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企业正向盈余管理越大则不会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负向盈余管理相比较,正向盈余管理更能够提高政府补助使用价值;然而当正向的盈余管理程度变得越高,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会变得越低。上述结论丰富和拓展了盈余管理及政府补助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印证了近些年我国监管机构致力提高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盈余管理;政府补助;边际价值;监管机构;会计信息质量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9)06-0055-8

据2016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A股市场2893家上市公司共计获得1655.65亿元政府补贴,尤其是中国石油因获得了85.09亿元的政府补贴成为其中的“补贴之星”。这不禁让我们深思,上市公司作为我国企业中的佼佼者,缘何能够取得如此大规模大面积的政府补助,是否会受上市公司某些行为因素的干扰而出现错配问题。现实中政府选择补贴帮扶对象时,盈余管理是其关注的指标之一^[1],企业的盈利或者亏损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能够获得政府补助^[2]。那么,上市企业是否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达到获得政府补助的相关标准从而侵占补助资金?这些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资金后能够有效利用政府补助吗?上述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一、文献综述

(一)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1. 企业所在地区。西部获得政府补助的程度比

中部地区小,但是西部地区获得政府补助的增长率却高于中部地区^[3]。

2. 企业所处行业。不同行业之间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也会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高科技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较高,且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所获得的政府补助规模大小、侧重点也有所不同^[4]。

3. 企业规模。企业的总资产和销售收入越高,获得的政府补助就会越多^[5]。因为企业的规模越大,给当地政府带来的税收越多,越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越能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4. 企业的政治联系。存在政治联系的企业能够给予企业更多获得政府补助的机会^[6];政府补助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会变得更明显,这表明政府补助的流向受到了政治联系的影响,而政府的寻租活动也削弱了政府补助配置的合理性与有效性^[7]。

5.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政府补助是企业 and 地方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当地政府在发放补助的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BJL096);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项目编号:17BGL006)

候会着重考察企业的会计盈余状况^[8],即上市公司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盈余越不理想,可以获得的政府补助也越多,但是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并不明显^[9]。

(二) 盈余管理动机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重点在于盈余管理的目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概念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盈余管理的动机有IPO动机、避免退市动机、配股动机等,从根本上来讲,迎合政府的监管要求是其主要的目的。

在研究盈余管理目的的文献中,王良成、陈汉文等^[10]通过研究配股的上市公司发现,企业绩效下降的一个理由是盈余管理,另外一个原因是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存在。蔡春等^[11]研究发现,第一次公开筹资的公司会实施盈余管理活动,还会选择真实的盈余管理手段,因为其不容易被发现。实施盈余管理是为了将股票发行价格抬高至顶峰,当公司的被管制水平处于比较低的情况时,实施盈余管理能够抬高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

在盈余管理方法的研究文献中,张继袖,陆宇建^[12]通过研究发现,较多地方政府也介入到当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中,以税收政策、财政补助等相关的优惠政策来帮扶上市公司由亏转盈、得到相关配股的资格。在目的性方面,夏峰^[13]将盈余管理分成了决策有用性、机会主义两种目的,并且发现企业中往往存在着决策有用性的盈余管理,而且其可以明显地提高企业价值。

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会为了自己的动机去补助相关企业以使其达到相关的财务标准,而很少去研究盈余管理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规模以及政府补助资金使用效果的影响。如果单单考虑盈余管理的程度,而不考虑盈余管理的方向,则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出现^[14]。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两类,企业进行正向盈余管理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动机是不同的。前者是指调高盈余,提高了公司当期业绩,使得对外披露的财务状况表现良好;后者是指降低盈余,降低了公司当期业绩,却有利于提升企业未来业绩。但是,我国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是粉饰报表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却很少去关注负向盈余管理^[15],且学者研究也大多集中在盈余管理程度上,却很少区分盈余管理的方向。基于此,本文拟从企业管理当局的动机出发,研究两种盈余管理对政府补助获取规模和资金

使用效果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盈余管理与政府补助

当地经济发展的程度、政治稳定性等与官员的仕途息息相关。对于地方政府,上市公司不但能够为当地创造财政收入、税收等经济效益,而且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对外传播出积极的经济信号,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形象与政绩。因此,政府一般都会愿意使用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等手段来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发展。

然而,政府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选择补助对象时会设定一定的标准。政府一般会重点关注公司的盈利情况,尤其是经历亏损的企业,因为它们很可能会通过解雇员工等方法来降低成本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作,当地政府为维护当地社会安定,就会通过政府补助帮公司渡过难关。因此,企业管理者就很有可能利用负向的盈余管理,有目的性地把当期的利润平滑到后期阶段来计入实现^[16],以使企业的财务业绩下滑,从而满足政府补助的相关标准,得到政府补助。由于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因此不需要依靠管理者的个人能力就可以提升公司的业绩。管理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不顾一切地想去获得政府补助,从而使公司业绩得到改善,最后让自己获得超出预期的薪酬^[17]。

余明桂等^[18]认为,我国政府补助的标准界限不够清晰,这种现象也为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无论是为了企业短期经济业绩的提高,还是为了谋取私利,公司管理层都有动机进行负向盈余管理,从而使得企业满足政府补助的标准,最终获得政府补助。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盈余管理对其获得的政府补助会产生影响。

H1a: 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负向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

H1b: 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对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不显著。

(二) 盈余管理方向与政府补助边际价值

从短期来看,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获得的政府补助可以增加当期的营业外收入,从而提高经营业绩,最终体现为补助效应的效益观。然而从长期来看,盈余管理活动扭曲了政府补助的最初期望(即帮助支持未来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活力企业),这可能会

导致更多的政府补助资源流入无须补助就可以正常运行的企业,那些原本需要政府补助才能更好发展的企业不能获得或者只能获得很少的政府补助,致使政府补助无法发挥良好效果。这一结果也被相关学者的研究证实,例如余明桂等^[18]实证研究发现,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所获取的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社会绩效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然而存在政治关联的财政补助与企业绩效、社会关系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唐清泉等^[19]通过分析上市企业发现,政府补助虽不能够提高其经济效益,但是却有利于发挥其社会效益。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 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盈余管理方向不同,其政府补助资金的使用价值也不同。

H2a: 其他条件不变时,正向盈余管理会使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提高。

H2b: 其他条件不变时,负向盈余管理会使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降低。

(三) 盈余管理程度与政府补助使用价值

与存在正向盈余操纵的公司相比,负向盈余管理的公司更有机会获得政府补助,由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可以知道,政府如果对负向操纵的企业投入越多,其产生的相关效果会越差^[20]。同时负向盈余管理会给外界带来一种经营不善的特殊信号,相关投资者就会比较谨慎地考虑是否投资。反之,如果企业进行正向盈余管理,要想得到政府补助就会变得困难,该类企业将会充分利用政府补助资金^[21],但是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会变得越来越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 相对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低的公司政府补助资金的使用效果更好。

三、实证设计与分析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3~2016年A股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计算盈余管理相关数据需要滞后一期,选择研究的数据样本是从2014年开始。同时按照研究的需要剔除了以下观测样本:没有披露政府补助信息的公司、相关研究指标缺失的公司、由于财务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而被处理的公司,最终得到3791个观测值。同时,为了剔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的Winsorize处理。本文上市公司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经济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1) 政府补助。政府补助(Sub),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得到的货币性资产或者非货币性资产,然而它并不包括由政府担任企业所有者角色时投入的资本。由于在规模不同的公司中,同样数值的政府补助或许可以造成不同的经济效应,因此通过结合分析孔东民等^[22]的政府补助变量衡量方法,在衡量政府补助指标时,收集了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政府补助数据。同时,为了避免该绝对数指标的局限性从而产生误导性结果,本文将政府补助与企业的总资产之比作为政府补助的观测值,即:政府补助(Sub)=政府补助总额/企业总资产。

(2) 政府补助边际价值。政府补助边际价值,表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每增加一单位要素投入所增加的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在当前的文献中,学者们使用过的衡量政府补助使用价值的指标有很多种,本文参照朱培玲等^[23]的研究方法,观察企业绩效的变化情况来度量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而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衡量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此指标用来衡量企业的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等。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净资产收益率(ROE)=税后利润/净资产。

2. 解释变量。本文选择的盈余管理的度量变量为应计盈余管理值(EM),应计盈余管理值参考了上一年度企业业绩的截面修正琼斯模型并且划分年度、不同行业来运用回归分析计算。具体的公式如下:

$$TA_t/A_{t-1} = \alpha_1(1/A_{t-1}) + \alpha_2(\Delta REV_t - \Delta AR_t)/A_{t-1} + \alpha_3(PPE_t/A_{t-1}) + \alpha_4ROA_{t-1}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TA_t表示的是总应计数,它等于第t期经营利润减去第t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A_{t-1}表示的是第t-1期的期末总资产;ΔREV_t为第t期主营业务收入与第t-1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ΔAR_t表示的是第t期和第t-1期应收账款的变化值;PPE_t为第t期期末固定资产的原值;ROA_{t-1}为前一个时期的总资产收益率。

ε_t为残差,代表盈余管理值(EM),本文将采用回归方法来估计上述模型中的每个参数,并由此获得残差。

Dr代表盈余管理的方向,即盈余管理值(EM)为正表示正向盈余管理,且金额越大,说明企业利用应计盈余管理的方法将企业的利润调高的程度越

大;若盈余管理值(EM)为负表示负向盈余管理,且金额越小,说明企业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手段将企业的利润调减的程度会越大。

在验证前文假设是否成立前,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正向盈余管理程度(Degree)下的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差异,本文先找出正向盈余管理操纵程度的中位数,超出中位数的为盈余管理程度高,相反小于中位数的为盈余管理程度低,区分为盈余管理程度高低的的不同两组来进行回归分析。

3. 控制变量。本文据蔡春等^[11]、唐清泉等^[19]和王福胜等^[24]的研究成果,设计控制变量如下: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成长性(Growth)。文中所涉及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政府补助	Sub	政府补助总额/企业总资产
	政府补助使用价值	ROE	税后利润/净资产
解释变量	盈余管理值	EM	通过修正琼斯模型计算得到
	盈余管理方向	Dr	盈余管理值为正则正向盈余管理,为负则为负向盈余管理
	正向盈余管理程度	Degree	以盈余管理操纵程度的中位数为标准,超出中位数为盈余管理程度高,低于中位数为盈余管理程度低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资产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三)构建模型

为了证明H1,本文将研究分析“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其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并且通过参照王红建等^[21]的研究成果,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2):

$$\text{Sub}=\alpha_0+\alpha_1\text{EM}+\alpha_2\text{Size}+\alpha_3\text{Lev}+\alpha_4\text{Growth}+\varepsilon \quad (2)$$

为了验证本文的H2,即分析盈余管理的方向能否对政府补助的边际价值产生相关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3)和模型(4)如下:

$$\text{ROE}=\alpha_0+\alpha_1\text{Sub}+\alpha_4\text{Size}+\alpha_5\text{Lev}+\alpha_6\text{Growth}+\varepsilon \quad (3)$$

$$\text{ROE}=\alpha_0+\alpha_1\text{Sub}+\alpha_2\text{Dr}+\alpha_3\text{Sub}\times\text{Dr}+\alpha_4\text{Size}+\alpha_5\text{Lev}+\alpha_6\text{Growth}+\varepsilon \quad (4)$$

为了验证本文的H3,即分析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能否对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产生相关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5)如下:

$$\text{ROE}=\alpha_0+\alpha_1\text{Sub}+\alpha_2\text{Degree}+\alpha_3\text{Sub}\times\text{Degree}+\alpha_4\text{Size}+\alpha_5\text{Lev}+\alpha_6\text{Growth}+\varepsilon \quad (5)$$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总样本、正向盈余管理样本、负向盈余管理样本三种情况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	变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全样本	3791	Sub	0.000	0.220	0.003	0.008
		EM	-1.051	1.404	0.002	0.097
		ROE	-4.690	17.190	0.061	0.392
		Size	17.388	28.508	22.733	1.352
		Lev	0.015	1.279	0.498	0.206
		Growth	-0.920	87.712	0.190	2.317
正向盈余管理样本	1915	Sub	0.000	0.220	0.003	0.010
		EM	0.000	1.404	0.060	0.084
		ROE	-2.353	18.125	0.080	0.259
		Size	17.878	27.320	22.747	1.282
		Lev	0.043	1.037	0.487	0.209
		Growth	-0.920	87.712	0.203	2.358
负向盈余管理样本	1876	Sub	0.000	0.225	0.004	0.007
		EM	-1.051	0.000	-0.056	0.069
		ROE	-4.690	17.198	0.041	0.491
		Size	17.388	28.508	22.720	1.420
		Lev	0.015	1.279	0.508	0.203
		Growth	-0.887	71.231	0.177	2.274

从表2可以看出:总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之间的政府补助金额因公司自身条件的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向盈余管理样本的Sub变量均值比负向盈余管理样本的Sub变量均值小,负向盈余管理样本Sub变量的极大值比正向盈余管理样本的Sub变量的极大值大,这与本文的H1a、H1b基本相符,初步验证了这两个假设。同时,负向盈余管理样本Sub变量的平均值也大于整体样本下所获得的Sub变量平均值。

不管是负向盈余管理公司还是正向盈余管理公司,其资本结构、企业规模都基本相同,这表明公司规模对公司盈余管理活动的影响不明显。正向盈余

管理公司成长性的极小值、极大值、均值都大于负向盈余管理公司,这表明处于正向盈余管理中的企业,其成长性要相对地强于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3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

	ROE	Sub	EM	Size	Lev	Growth
ROE	1					
Sub	0.0198***	1				
EM	-0.3764	0.1228***	1			
Size	-0.3336**	0.2665***	0.4311***	1		
Lev	-0.1235	-0.2365**	0.0985	0.0778***	1	
Growth	-0.0131**	0.0691**	-0.0495	0.0113***	-0.2642**	1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3的相关性分析矩阵可知:在A股企业中,政府补助和政府补助使用价值在1%的水平上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初步证明了假设2,即政府补助对企业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有显著的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值与政府补助二者在1%的水平上表现为显著相关关系,这初步证明了假设1,即企业盈余管理对企业取得的政府补助有影响。

另外,资产规模与政府补助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资产规模对上市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有着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企业的成长性和政府补助二者在5%的水平上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表明政府倾向于去关注那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发展潜能的企业,并且倾向给予其一定的经济支持^[25, 26]。

综上所述,变量之间的显著性检验初步证明了本文的变量选取、模型构造以及假设设计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为了量化各个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的关系程度大小,本文将会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来解释描述分析变量间存在的线性关系。

(三)回归分析

通过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本文将会进一步探讨盈余管理、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来验证假设的合理性,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

1. 盈余管理方向与政府补助。有关盈余管理方向与政府补助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盈余管理方向与政府补助

	模型(2):Sub		
	正向盈余管理	负向盈余管理	整体样本
EM	0.0092*	0.1475***	0.1335***
Size	0.8836**	0.7058***	0.7711**
Lev	0.0522*	0.5874	0.2618*
Growth	0.5658***	0.2716**	0.3015**
N	1915	1876	3791
F-value	48.9362	50.1519	109.0528
Adj. R ²	0.6655	0.5728	0.4998

从表4可以看出负向盈余管理的样本中,EM的回归系数为0.1475(P<0.01),说明负向盈余管理程度每增加1单位,政府补助强度就会增加0.1475单位。这说明负向盈余管理下,盈余管理程度与政府补助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负向的盈余管理能够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因此本文的H1a成立。

然而,在正向的盈余管理样本中,其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正向盈余管理不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本文的H1b成立。另外,倘若从控制变量所得到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来观察,公司的资产规模和政府补助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能够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金额造成影响。同时,企业的成长性和政府补助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当企业的成长性越好时,所得到的政府补助金额会相对越多。资本结构变量与政府补助变量二者之间的系数大于零,然而没有达到显著性要求,这表示其对政府补助造成的影响比较有限^[27-29]。

2. 盈余管理方向、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使用价值。盈余管理方向、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使用价值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盈余管理方向、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边际价值

	模型(3)和模型(4):ROE		
	正向盈余管理	负向盈余管理	整体样本
Sub	0.0554***	-0.0125**	0.0016**
Dr	-	-	-0.0652**
Dr×Sub	-	-	-0.0022***
Size	-0.0012*	-0.0408*	0.0142
Lev	-0.0024*	-0.0736***	-0.0659***
Growth	0.0618**	0.0027*	0.0012**
N	1915	1876	3791
F-value	44.2866	37.9958	57.6244
Adj. R ²	0.5507	0.6058	0.7125

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正向盈余管理企业中,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使用价值的回归系数为0.0554,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补助规模与企业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有着正相关关系,并且每获得一单位的政府补助就会增加0.0554单位的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因此本文的H2a成立。

负向盈余管理企业中,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使用价值的回归系数为-0.0125,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补助规模与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有着负相关的关系,并且每获得一单位的政府补助就会减少0.0125单位的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这说明负向盈余管理会降低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因此本文的H2b成立。

盈余管理方向和政府补助的交乘项的系数值为-0.0022(P<0.01),这说明当盈余管理的方向充当调节变量时,会影响政府补助和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二者间的关系。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资产负债率与政府补助边际价值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成长性则有利于提高政府补助使用价值。

3. 正向盈余管理程度、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边际价值。三者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正向盈余管理程度、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边际价值

	模型(5)ROE		
	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高	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低	正向盈余管理整体样本
Sub	0.0675**	0.1192***	0.0819**
Degree	-	-	-0.0021**
Degree×Sub	-	-	-0.0087**
Size	-0.0082**	-0.0021*	-0.0031**
Lev	0.1112***	-0.0418***	-0.0083***
Growth	0.0054**	0.0714**	0.0007**
N	1023	892	1915
F-value	33.6415	52.0528	34.6912
Adj. R ²	0.6581	0.5914	0.6718

从表6可以看出,在按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划分的高低两组中,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的边际价值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低的数据样本中回归得出的Sub的系数为0.1192(P<0.01),在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高的数据样本中回归得出的Sub的系数为0.0675(P<0.05)。可以看出,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低样本的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无论

其显著性还是系数,均大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高的样本。这说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低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发挥的效用比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高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发挥的效用更大,因此本文的H3成立。

而且,政府补助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变量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即原本在正向盈余管理方向下,Sub与ROE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当加入正向盈余管理程度(Degree)的调节变量后,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边际价值仍是显著关系。但是政府补助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的交叉项系数为-0.0087(P<0.05),该交互项系数小于零,这表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的大小对政府补助与政府补助使用价值的正向关系有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政府补助对政府补助使用价值的提升作用就会越小。这也预示着,在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变得越大的时候,政府补助的经济资源会被扭曲得越严重,政府补助发挥的效用会越低,政府补助边际价值所受到政府补助的积极正向作用会变弱,即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就越低,进一步证明了H3。

从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来看,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当公司的规模越大、负债水平变得越高时,都对政府补助使用价值有着消极作用。而且,企业成长性变量基本显著为正,这表示当企业的发展潜能越大时,政府补助使用价值会越高。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中结论的可靠性,检验上述回归的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本文采用变量的替代方法重新对变量数据进行回归,以检验变量的不同衡量方式对验证结果稳健性的影响。被替代的变量有:①政府补助的替代衡量指标,采用“政府补助除以营业收入(Sub₀)”替换“政府补助除以总资产(Sub)”。②企业绩效的替代衡量指标,采用“总资产报酬率(ROA)”来替换“净资产收益率(ROE)”。

最终所得到的稳健性回归结果除其中相关回归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系数的大小有些许不同之外,由稳健性回归结果所得出的结论与本文前述结论一致,经过实证得到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将2014~2016年国内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

究样本,分析验证了企业盈余管理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企业中,与正向盈余管理相比较,负向盈余管理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然而与负向的盈余管理活动相比,正向盈余管理更加能够提升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但是当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变得越高时,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却会变得越低。

以上的实证结果说明,政府对当地上市公司进行补助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企业扭亏为盈,而企业的管理层则会通过负向的盈余管理方式来迎合当地政府的补助标准。事实上,政府更加愿意去补助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上市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会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产生政策性风险,进而降低了政府补助的使用价值。

由此可见,当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助的时候,需要关注公司盈余管理活动存在的可能性,积极搜集信息来提高政府补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降低政府补助的政策性风险,从而促使政府补助的经济资源能够被更加合理有效地分配利用。

(二)启示

为了提高政府补助的使用效率,同时结合政府和企业自身情况以及本文的实证结果,得到以下启示:

1. 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补助的筛选程序,妥善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我国,目前暂时还没有清晰、详细的政府补助标准,这就使得政府补助的评判更加不透明,同时也给寻租活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是服务的提供者,不应该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应该更加注重服务的公益性。政府应该转变自身职能,在市场允许、法律合规的范围内给予企业相应的指导,努力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当企业处于没有发展前景、缺乏社会效益的阶段时,政府应该主动退出,适时转移政策的扶持方向,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从而实现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带动经济发展^[30]。

2. 加大审计的监督力度,规范政府补助的使用程序。对使用政府补助来达到上市目标的公司应加强审计,同时也应加强对批复政府补助的部门的财政审计。在公司的审计中,应该注意到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了非法的盈余管理活动、财务信息的披露是否合法、合规;在政府审计中,要加大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力度,促进政府财政预算管理的完善,不断强化对

财政补助的审计工作,防止扰乱资本市场的情况出现^[31]。

3. 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能够很好地约束、调节企业的经营活动,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在调节机制,处于企业中枢神经的重要地位。当企业的内部控制比较完善时,无论是对财务活动、经营活动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盈余管理活动也会相对减少。当企业面临经济困难时,政府也会积极地向这些内部控制完善、有持续发展潜力的企业伸出援助之手,为企业再次注入经济、政策上的活力。这对整个资本市场也是一个良好契机,可以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促进资本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4. 企业应该在会计准则和法律规定的限定范围内,合理地采用会计政策。这样才能尽量减少盈余操纵活动,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发生。同时要将政府补助实实在在地运用到技术科研和摆脱经济困境中,从而提升公司的竞争水平,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企业要有清醒的认识,明白政府补助并不是无偿的,从而不断增强对政府补助使用的责任意识,严于律己,自觉地遵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逐渐形成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合理、合规、公平的社会补助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 [1] 朱松,陈运森. 政府补贴决策、盈余管理动机与上市公司扭亏[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9(3): 92~140.
- [2] 陈晓,李静.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探析[J]. 会计研究,2001(12):20~28.
- [3] 步丹璐,郁智. 政府补助给了谁:分布特征实证分析——基于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J]. 财政研究,2012(8):58~63.
- [4] 邹彩芬,张惠,李静,张燎. 政府补助的动机、实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传统与新兴产业的对比分析[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2):58~64.
- [5] 刘亚莉,张曼迪,马晓燕. 地方政府补助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J]. 财会月刊,2010(36): 51~54.
- [6] 王苑和,孙长江,李炜. 地区、企业特征与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J]. 财会通讯,2014(12):100~102.
- [7] 郭剑花,杜兴强. 政治联系、预算软约束与政府补

- 助的配置效率——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 金融研究, 2011(2): 114~128.
- [8] 景崇毅, 李玉萍. 政府补贴、盈余管理及高管收益相关理论综述[J]. 财会通讯, 2012(30): 75~77.
- [9] 王昕, 黎文靖. 政府补助、审计意见与盈余管[J]. 财会通讯, 2016(21): 12~16.
- [10] 王良成, 陈汉文, 向锐. 我国上市公司配股业绩下滑之谜: 盈余管理还是掏空?[J]. 金融研究, 2010(10): 172~186.
- [11] 蔡春, 李明, 和辉. 约束条件、IPO 盈余管理方式与公司业绩——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J]. 会计研究, 2013(10): 35~42.
- [12] 张继袖, 陆宇建. 控制股东、政府补助与盈余质量[J]. 财经问题研究, 2007(4): 41~47.
- [13] 夏峰. 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15(2): 106~107.
- [14] Hribar P., C. Nichols. The Use of Unsigned Earnings Quality Measures in Tests of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7(5): 1017~1053.
- [15] 薄仙慧, 吴联生. 盈余管理、信息风险与审计意见[J]. 审计研究, 2011(1): 90~97.
- [16] 邵毅平, 张健.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市场反应与政府监管[J]. 财经论丛, 2011(1): 77~83.
- [17] 罗宏, 黄敏, 周大伟, 刘宝华. 政府补助、超额薪酬与薪酬辩护[J]. 会计研究, 2014(1): 42~48.
- [18] 余明桂, 回雅甫, 潘红波. 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 经济研究, 2010(3): 65~77.
- [19] 唐清泉, 罗党论. 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07(6): 149~163.
- [20] 陆少秀, 冯树清. 所有权性质、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会通讯, 2016(6): 45~47.
- [21] 王红建, 李青原, 邢斐. 金融危机、政府补贴与盈余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4(7): 157~167.
- [22] 孔东民, 刘莎莎, 王亚男. 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J]. 经济研究, 2013(2): 55~67.
- [23] 朱培玲, 徐怀伏. 医药上市企业盈余管理、政府补助与绩效的实证研究[J]. 中国医药导刊, 2017(12): 1417~1422.
- [24] 王福胜, 程富, 吉姗姗. 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比较视角[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2): 95~106.
- [25] 黎精明, 王溶健. 财务柔性、企业规模和企业价值的相关性[J]. 财会月刊, 2017(23): 46~51.
- [26] 闫华红, 李晓芹. 企业价值与负债结构的关系研究[J]. 会计之友, 2009(12): 15~19.
- [27] 刘星, 刘伟. 监督, 抑或共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J]. 会计研究, 2007(6): 68~75.
- [28] Chan K. C., Farrell B. R., Lee P.. Earnings Management of Firms Reporting Material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Under Section 404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2): 161~179.
- [29] Dechow P. M., Skinner D. J.. Earnings Management: Reconciling the Views of Accounting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Regulators [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0(2): 14~24.
- [30] Ghosh A., Marra A., Moon D.. Corporate Boards, Audit Committe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Pre- and Post-SOX Evide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10(9-10): 1145~1176.
- [31] Mitra S., Hossain M.. Auditor S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of Firms Reporting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Under SOX Section 404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0(2): 209~215.
- 作者单位:**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2.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